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七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四六期 ——
(二〇〇八年五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5c)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印红标
【研究综述】	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 ——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佟 新·沈 旭
【文献资料】	上中共中央、毛泽东书	姜明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 印红标 •

“武斗”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特殊用语，指群众运动中的打人、殴斗等侵害人身的暴力行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写大字报、开批判会，凡语言文字形式的斗争，称为“文斗”。与之相对，凡动手打人，均称为“武斗”。本文着重从武斗的行为类型、领导者的政策误导以及思想文化原因等方面做初步分析，以求从一个方面反省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悲剧。

一、武斗的行为类型

依据发生条件以及参与者行为和心理特征的差别，可以将武斗分为：“红色恐怖”、派别冲突和刑讯逼供三种主要类型。

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普遍的暴力现象是对被批判者、被斗争者的殴打和折磨。红卫兵曾经称之为“红色恐怖”。

批斗活动中的打人现象可以说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同时产生，但是在1966年7月中

旬以前，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制止，武斗被控制在最低限度。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并决定从学校撤出工作组，武斗之风由此抬头。尽管中共中央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但是在8月下旬至9月底的红卫兵“破四旧”活动中，武斗盛行，造成了触目惊心的严重后果。据当时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市，8月至9月期间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8月底最甚，8月27日至29日三天，共有395人被打死。另据当时统计，在上海，9月1日至25日，市区489所中学中，有361所中学的红卫兵有打人行凶。被打的达一万余人，被打死的有11人，被打伤的有961人。〔2〕

如此骇人听闻的暴力令社会震惊，也引起文革领导者的关注。8月底9月初，中央加强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宣传和说服，武斗的狂潮有所回落。在北京，9月中旬以后，打人致死现象明显减少。但是，对被批斗者的殴打和人身残害没有停止，并且往往是非常残暴的。

这类武斗多发生在群众批斗会上、关押“牛鬼蛇神”的“劳改所”里，往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的，带有打给众人看的意味。其基本出发点是对“阶级敌人”实行震慑和惩罚，造成革命的气势和威风。一些红卫兵散发传单，宣传“红色恐怖”。北京六中红卫兵把“红色恐怖”几个大字写在他们私设的“劳改所”的墙上。在不少红卫兵看来，不造成一点革命恐怖，就不足以显示革命的声威。“暴力行为被作为‘革命’的外在表现形式。”〔3〕打人一旦成了风行一时的“革命”举动，就造成一种政治压力，一种使意志懦弱者感到恐惧的压力，推动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为了保护自己而投入暴力活动。这一点，在未成年的中学生中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位红卫兵的发起者回忆道：“在群众运动的场合中，第一个打人的人希望引起大家注意，打了第一下以后就没法停止。所有的人都要表示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他们对敌人的恨和对领袖以及运动的热爱。”“打起人来，谁也不能示弱，如果不打，就意味着革命不坚定。而同情在当时是一个很奇怪的词。”〔4〕

这些青少年和被迫害者之间极少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他们只是在观念上感到应该恨“阶级敌人”。从心理方面分析，他们的反常行为往往不是“革命义愤”和“朴素阶级感情”的自然表露，而是为了表现这种义愤和感情，或者是为了表白和洗清自己，因而要当众表现。在打人活动中，某些女中学生的凶残令人目瞪口呆。在北京，有两所著名女校的校长，被本校学生毒打致死。这或许与女青年当中常见的强烈表现欲和虚荣心有关。当时的时尚是“不爱红妆爱武装”。

武斗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被害者，并且吞噬着施暴者的良知，使人性中丑恶的因素膨胀，使一些本来不乏友爱、纯真的青少年变成十足的迫害狂。

应当指出，是否参与打人还是可以选择的。事实上多数学生没有参与武斗。而且，即使是红卫兵，也不都参与过武斗，一部分红卫兵还发表通令、文章，要求坚持“文斗”，反对“武斗”。〔5〕因此，武斗参与者是应当自省并承担责任的。

第二类武斗是派别武斗，指发生在对立的群众派别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是由政治派别斗争发展而来的暴力较量。在行为方式上派别武斗不是单方的施暴，而是对立双方有组织的战斗，这是它与“红色恐怖”武斗的显著差别。

派别武斗发生在群众组织分化为政治观点对立的两种或多种派别以后，出现的时间晚于“红色恐怖”武斗。1966年9月，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为反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学生在地质部的静坐，动了拳头，这是早期派别武斗的实例。同年12月，上海发生“康平路事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向闯进上海市委大院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的两万工人发起暴力进攻，两派工人在上海的其他地点同时发生冲突，这是最早发生的大规模派

别武斗之一。

1967年夏季，派别武斗遍及全国，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同年夏秋，毛泽东为了控制局势，实现他的文化大革命战略构想，加强宣传，强调反对武斗。至1968年秋，群众组织相继解散，派别武斗逐渐消失。但是在个别地区，武斗仍然时断时续进行到七十年代初。

派别武斗的目的是用暴力压倒或者消灭政治上对立的组织或者派别，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组织或者派别。武斗的宣传口号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斗双方同时高举红旗，高喊毛泽东语录而互相厮杀的惨剧并不罕见。然而派别武斗屡禁不止的更深刻原因在于争取自己一派的政治权力。派别的形成具有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派别一旦形成就要争夺自己的政治利益。1967年夺权以后，两派争论的问题，诸如左派的地位、对军区“支左”的评价、结合哪一位领导干部、革命委员会中的席位分配等等，实质上都是为了攫取权力。政治权力的争夺是比“保卫毛主席”更直接、更现实的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多次亲自批示禁止武斗，仍然收效不大的原因。

派别武斗常常是有组织进行的，至少进攻的一方是进行了部署的。武斗的方式从挥舞拳头棍棒到动用武器，从小股偷袭到成千上万人的“大兵团作战”，无所不有。许多强大的群众组织成立了专门的武斗队。

由于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武斗以及普通群众的强烈反感，派别武斗的组织者在宣传上往往极力推卸自己一方的责任，指责对方“一小撮坏头头”挑起武斗，声称自己方面是受害者，是迫不得已的自卫，是为惩罚凶手等等。这些行为特点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中的武装冲突十分相似，而与打给人看的“红色恐怖”武斗不同。

派别武斗造成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目前尚未见到全面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仅四川省宜宾地区的三次武斗，就造成两千多人死亡，八千多人伤残。（6）派别武斗的直接受害者是参加武斗的群众组织成员，大部分是青年。据报道，仅重庆的一座“红卫兵墓”，就埋葬了近五百名武斗死难者的尸骨或者骨灰。（7）派别武斗造成双方群众强烈的仇恨。一次暴力冲突往往酿成另一次报复行动，一次更大规模的武斗。如此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欲罢不能。

武斗不得人心。派别武斗促使很多普通群众由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转变为退避的逍遥派。当时，人们很难在理论上立即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却很自然地在感情上厌恶群众之间的厮杀和对公私财产的公然毁坏。当派别头头和武斗悍将们头脑发热时，普通群众对运动越来越冷淡，二者同步发展。经过1967年至1968年的“全面内战”，文革运动的群众基础已经全面动摇。

第三类武斗是刑讯逼供型的武斗，指在“群众专政”等各种群众性的违法和超越法律的关押、审讯当中的暴力行为，这里暂不涉及国家专政机关的暴力行为。

这类武斗的目的在于通过拷打、折磨，取得口供。这种武斗在群众运动中很常见。不仅在群众组织私设的公堂，而且在革命委员会、党委、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军管会等官方和半官方组织领导的群众性的专案审查、群众专政队、学习班当中，也时有发生。

逼供中的暴力行为都是秘而不宣的。尤其是各类专案审查的工作人员，更是对此讳莫如深。对外界，他们总是唱反对“逼供信”的高调。

二、文革领导者的政策误导

文革领导者的政策误导是造成武斗频频发生的直接原因。文革领导者，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或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原则上不赞成武斗，多次郑重声明：“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8〕但是，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总体指导方针上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动乱，致使群众暴力行为发生。不仅如此，“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在具体实施中，还常常因为领导者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需要而被打折了扣，某些作法甚至直接助长了武斗的蔓延。当然，所谓“触及灵魂”的“文斗”也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全民族的摧残，更多地是通过“文斗”实现的，这里姑且不论。

毛泽东决定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式，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揭露阴暗面，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史无前例的运动方式抛开地方和基层的党政组织体系，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群众。但是，实际上中央很难有效控制局面，因而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造成了群众暴力赖以滋生的土壤。

就政策的具体实施而言，文革领导者将群众的暴力行为视为革命左派的过激举动，是“支流”，担心严厉制止的作法会打击左派的积极性，给运动“泼冷水”，所以没有果断实施禁止武斗的政策。这是红色恐怖类型武斗得以肆虐的政策原因。

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十分注意制止混乱和暴力，向全国推广了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乱斗”（包括打人）事件的办法。但是，毛泽东却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由此，很多领导人在群众运动面前缩手缩脚，担心重蹈刘少奇的覆辙。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在同一个文件中又说：“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文良恭谦让。要让群众在这个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9〕这就给群众运动中违背常规，违背法律的激烈行为提供了政策依据。

红卫兵“破四旧”活动开展以后，《人民日报》和所有的宣传媒介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和欢呼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并且声称：“谁要是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10〕因此，红卫兵有恃无恐，暴力行为有增无已，而很多群众和干部对暴力十分反感却不敢出面坚决制止，“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怕被围攻。”〔11〕

8月24日以后，红卫兵打人致死的恶性事件激增，文革领导者感到问题严重，才通过报刊社论、首长讲话等形式，要求红卫兵：“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12〕地方党组织也发布通知要求制止武斗。〔13〕

制止武斗的方法是劝说，而不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系统的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是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14〕实际上，这不仅是谢富治个人的意见，而且是当时中央的基本政策。其他领导人在对群众的讲话中也表示：第一，不要用武斗，不能打人；第二，出于义愤，打就打了，但是此风不可长，

今后不能再打人。(15)

1966年年底，文革领导者曾经支持造反派谴责老红卫兵的打人行为，还同意拘留了几名参与打死学生和教职工的北京红卫兵。这些严厉的措施固然是为了制止武斗，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了推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为了压制老红卫兵对这一运动的反感和抗拒。对于造反派的打人，文革领导者仍然采取姑息的政策。

实际上，中共领导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作法是在运动的发动阶段强调反对右倾保守，防止限制过多，而在运动兴起，达到高潮以后，强调政策，反对过激。因此，对群众运动初期的违反政策的暴力行为往往不多指责，而着重引导。1966年6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一次市委工作会议上谈到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打人现象，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他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如果你是坏人，打了活该；如果你是好人，右派打了你，那是光荣；好人打了好人，那是误会，可以消除误会。不打不相识。”(16)李雪峰被认为是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他所依据的是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传统经验。他所引用的毛泽东讲话，看来是文革以前，很可能是1949年以前针对群众性政治运动中的打人现象讲的。文革期间，江青和林彪关于打人问题的某些讲话，其精神应当也是缘于毛泽东的这段讲话。(17)

对于群众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文革领导者也是反对的。但是，当中央中意的所谓“革命左派”在与所谓“保守派”的冲突中处于劣势，甚至有可能被保守派的暴力击垮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提出“武装左派”、“文攻武卫”的口号，其结果是加剧了武斗。

1967年“夺权”以后，遍布全国的群众组织派别斗争异常激烈。在很多省份，如湖北、河南、广东和四川，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地方“支左”部队在判定哪一派群众组织是左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地方军区支持政治观点比较保守、稳健、人多势众的群众组织或派别，而中央则主张被军区冷落、排斥甚至打击的激进少数派才是真正的左派。1967年春夏，派别武斗不断升级，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武斗，但收效不大。在一些省份，激进的小派别有被保守的大派别击垮的危险。

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南下视察到达武汉。毛泽东和中央对武汉地区文革的意见是：“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支持“百万雄师”，压制、打击“三钢三新”，犯了方向性错误。(18)然而，当时武汉的派别斗争形势是，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派在派别冲突，包括武装冲突中，占有明显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武装左派”。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对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人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19)

7月20日，愤怒的“百万雄师”派的部分群众和某些军人劫持了具有中共中央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身份的王力，企图逼迫王力表态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一事件使身在武汉的毛泽东和在北京的其他中央领导人极为震惊。

7月22日凌晨，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方面代表时肯定了群众组织提出的“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群众组织立即接过这个口号，作为武斗的政策依据。

8月4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提出两项任务：一个是要武装左派，一个是要实行群众专政。毛泽东在信中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要武装左派，建立第二武装。(20)

8月5日，林彪在北京主持中央的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来信精神。此后，开始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向群众组织发枪。（21）一些地区的群众组织得不到枪支或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武器，干脆抢劫军械仓库。很多群众组织以“文攻武卫”命名他们的武斗指挥部。群众组织有了武器，有了政策依据（各方都声称是武装自卫），大规模武斗在全国各地急剧升级。与此同时，造反群众与“支左”军队的冲突也空前激烈。文化大革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内战”。

毛泽东和中央很快意识到形势严重，难以控制，于是再次强调禁止武斗，要求群众上缴枪械，但是实施起来已经很艰难了。

文革领导者提出“武装左派”、“文攻武卫”的口号，其意图是在反对武斗的前提下，在业已发生武斗的情况下，给处于劣势的“文革群众组织”以武装自卫的权利，目的在于保护“左派”。但是，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武斗。从上述历史资料看，这一严重的决策失误主要来自毛泽东。首先是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群众，其后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因而，不仅应当批判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更应当否定“武装左派”的政策。

对于在群众性的审查、关押等“群众专政”活动中的暴力行为，文革领导者也是反对的。但是放手让未受过专门法制训练的群众实行“群众专政”，就很难避免发生刑讯逼供。事实证明：“群众专政”是非法虐待和暴力的渊藪。

三、武斗的思想和文化原因

武斗作为普遍发生的群众性社会现象，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原因。这里仅对其中表现最突出者，做初步的探讨。

极端的阶级斗争观念是群众性暴力行为的重要思想原因。文化大革命以前，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以后，在全国人民中间，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偏激的阶级斗争观念深深地烙印在青年一代心中。

在阶级斗争教育中，人道主义、人性论、宽容、宽厚、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先贤古训均被当作阶级斗争观念的对立物、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受到批判。至于人权的观念，则从五十年代就被驱逐出课堂和思想领域。可以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青年学生不知人权为何物。在他们中间，主导的观念是认为阶级的友爱和仇恨应该超越和压倒其他人间亲情，“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22）对敌人的打击和惩罚方式只决定于共产党的政策，而不受道德和良知的制约。

当文化大革命如大潮汹涌而至的时候，不仅是运动的先锋，而且那些不甘于被大潮抛弃的人们，都竭力表现出坚定的阶级立场，深厚的阶级感情，表现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武斗即是这种表现的极端形式。（23）

对暴力的崇尚是武斗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原因。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战争和暴力占有重要的地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政治权力的与夺以至价值判断的关键均在于战争的胜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这一著名论断道出了暴力在中国政治历史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依靠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取得政权的，因而一向崇尚暴力革命，包括民众暴力。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文中对农民暴力的高度赞扬，是表现他思想精髓的经典文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名言不仅部分地被引用进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十六条》，而且被谱写成歌曲传唱，为千百万群众所熟知，当作他们追求暴风雨般的群众运动场面，以至民众暴力的依据。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一位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说：“要武嘛。”毛泽东的本意应当只是表示对威武精神面貌的赞赏，但是这件事情被传播媒介报道，事实上助长了动用武力的气氛。尽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则上不赞成武斗，但是，在崇尚革命暴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很自然地倾向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新的革命中运用暴力。

非暴力主义不是中国政治运动的传统。在新中国的教科书中，非暴力主张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受到贬斥。当时的青年向往的是疾风暴雨般的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

“红色恐怖”这一词条，直接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如此，国民党统治大陆和统治台湾期间，也采用过“白色恐怖”政策。可见暴力和恐怖行为在国际国内政治传统中都有着深刻的渊源。

缺乏民主和法制观念是武斗盛行的又一重要思想文化原因。

中国的政治文化，缺乏民主的传统。人们习惯于在乱世接受暴力斗争的结果，在治世敬畏政权的权威，而没有依据法律规定的民主程序，服从多数选择并保护少数权利的传统。

中国的政治文化重人治而轻法治，因而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中国历史上不乏法律规定，但是法律从来都是有弹性的。政治权威，不论是皇帝、军阀，还是执政党，都比写在纸上的法律更有效力。从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法律制度。领导者长期沿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根据地的办法，更多地依靠党的政策而不是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毛泽东更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和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群众性政治运动超越法律的作法就已经形成惯例，文化大革命只是将这种作法推向极端。有所不同的是，文革前，多数是党政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有权决定批判、斗争、审查（包括“隔离审查”即限制人身自由）群众；而在文革最初的两年时间，毛泽东发动群众，让造反的群众决定批判、斗争、审查领导干部中的哪些人。前者是有组织地超越法律，后者是半无政府地超越法律。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论是领导者还是群众，对武斗和其他非法暴力行为的反对和谴责，所依据的都是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而不是法律。其原因十分明显，其一，现实政治中，法律缺乏权威性和效力，并且已经被破坏；其二，人们缺乏法制观念。

文化大革命高擎“革命”、“造反”的旗帜，而从来的革命和造反，都不可能按照常规办事，不可能顾及法律，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成为了“无法无天”的十年。

结束语

红卫兵以威慑和惩罚“阶级敌人”，显示革命声威为目的的“红色恐怖”暴力行为，群众组织之间以争夺派别政治权力为目的暴力冲突以及“群众专政”活动中的刑讯逼供，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武斗的主要类型。

文化大革命领导者的政策指导失误，是武斗失控、蔓延的政策原因。文革领导者原则上反对武斗，但是，由于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抛开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体系开展运动，形成中央难以控制的动乱局面，群众暴力由此滋长。文革领导者在具体政策运用上的失误，例如支持红卫兵“破四旧”活动，提出“武装左派”、“文攻武卫”和“群众专政”等政策，助长了武斗之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发生的群众性暴力行为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其中最直接的，是极端的阶级斗争观念，对暴力的崇尚和普遍缺乏民主和法制意识。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悲剧，武斗是其中血淋淋的一幕。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已经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八十年代以来，不仅经济发展，人们的社会政治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八十年代民众运动中非暴力的呼声和实践已为世所瞩目。这种新潮流的出现，与文革中武斗的惨痛教训和人们对武斗的揭露和谴责有着直接的关系。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2. 根据《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小组1987年5月编写的《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刊载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5月，《增刊》（17）。又据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每日快报》，1966年8月31日报道：据北京市公安局不完全统计，8月24日至29日打死551人，其中城市地区27日打死88人，28日打死68人，29日打死39人；农村27日打死23人，28日和29日两日打死177人。上海的情况据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辑小组1992年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3. 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2年版，第115页。

4. P女士，文革时北京的著名红卫兵领袖，199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谈话。

5. 参见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1966年8月6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通令（1966年8月29日、9月3日和9月9日）。

6. 据新华社成都1987年7月14日电，见《人民日报》1987年7月15日，第2版。

7. 据陈晓文、覃祭红：《山城有一片红卫兵墓》，《中国青年研究》，北京，1993年第5期，第27页。

8. 《人民日报》1966年9月5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9. 同注1。

10.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11. 据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每日快报》，1966年8月31日报道。

12. 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9月1日。

13. 例如：北京市委于1966年9月2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见《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4. 谢富治1966年8月下旬的两次讲话，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3页。

15. 见1966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的讲话。另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的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73页。

16. 转引自《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7. 江青在1966年7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1967年8月9日，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领导人时讲道：“（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是以毒攻毒。（三）坏人斗了好人，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四）好人斗好人，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18. 据笔者1990年至1993年对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多次访谈以及王力提供的材料。王力说，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谈话时，他做了记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曾拿出王力的原始记录，要求王力辨认笔迹。王力的回忆，部分收入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可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 同上。

20. 据笔者对王力的访谈以及王力提供的资料。王力说：1966年8月在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曾拿出8月4日毛泽东的信给与会者传阅。当时，王力抄录了此信，至今印象深刻。以上情况，王力早已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作过说明。

21. 据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主办：《井冈山》报，1967年8月22日报道。又据笔者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对负责人的访谈。实际上发枪的工作仅仅做了试点就停止了，全国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

22. 见雷锋日记（1960年10月21日），《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4年版。

23. 顺便提一句，据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某地的暴力事件中曾经出现过食人的形象（见郑义：《红色纪念碑》）。笔者认为食人现象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所致，而是个别边远地区的恶习在文革中的复发。

□ 原载香港《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第2期。转载于季羨林主编，牛汉、邓九平执行副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

~~~~~

## 【研究综述】

### 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 佟 新 · 沈 旭 ·

一

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ric J.）将二十世纪称作是“极端的年代”，而如火如荼地展开于神州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下文简称为“文革”）无疑是这一“极端的年代”中的极端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文革不仅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学术领域，更意味着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文革是多重经历的重叠，是多重情感的交汇，是中国现代社会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976年文革终结以降，大陆有关文革的描述与回忆性文章呈现汗牛充栋之势，但具有理论分析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多见。学术界对文革研究的缺失，主要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定调，屏蔽了学术界对于文革的言说和表达的空间。中国的学术界所面临的困境是——文革是一个不可涉猎的禁区，但又是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学术界有关文革的研究似乎在逐渐放开，在坚持意识形态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学术界有了更多与国外进行学术对话的机会，使得研究逐渐从政治导向转到了学理导向。

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每至文革的十周年纪念年都会展开文革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有一批著作译为中文。如 Franz Schurmann 所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非比寻常的事件，这对于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是一次惊人之举，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许多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和分析的有效性，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Schurmann, 1968, p. 504）

这意味着诸多在文革前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中的种种预设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成为西方学界寻求重建理论的一种努力。而这些努力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理论、数据与资料的公开程度及学界的关注度等差异而呈现出了各异的学术成果。

1993年，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指出了西方在文革研究对象选取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领袖取向和群众取向。这意味着在文革中，在上层领导的争权夺势之外，还存在着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借用 Lefebvre 的“平行革命”的概念，作者认为文革也同样是一系列的“平行运动”，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和基层的造反派在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的得益是平行的。这种判断暗合了“两个文革”的提法，意指文革是同时在上层领导和基层群众中展开的。通过对于文革时期武汉地区的个案性的地方经验的描述，王还指出了原先比较盛行的假设——毛的超凡魅力（charisma）对于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主导性影响的不成立。王通过一些个案访谈得出“（个人）在文革前社会中之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文革中参加哪一派”，并且大多数人在运动中其实是扮演了“逍遥派”的角色。同时由于四点原因，即（1）不一致的目标；（2）不适当的纲领；（3）畸形的传播媒介；（4）靠不住的执行机构，从而使得毛对于文革的发展完全失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毛和群众之间“偶像-崇拜者”的平衡关系，还群众以历史运动的主体性位置。通过将群众视为能动的历史行动者，作者强调了运动本身的逻辑，也完成了这样一种预设——对毛泽东的“超凡魅力”（charismatic authority）的正当性的批判。（Wang, 1993）

本文将王绍光的“两个文革”的思想拓展为“国家与社会”视角，关注国家权力及这种权力与其影响下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更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革研究便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有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本文将沿着这三条线索展开梳理。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革成了一个标杆，可以接通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以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值文革开始四十周年之际，写作本文，也是为了深入地了解文革前的三十年和文革后的三十年。

## 二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新中国的认识，西方学术界常常会将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与伟人“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从这一意义上看，对毛泽东的研究就是对一个“领袖魅力型权威”社会的认识。

### （一）极权政治与个人权威

早期的文革研究很多集中于对毛泽东与新中国政权关系的理解上。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预设：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二是毛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渗透。

就文革研究而言，其基本认识是将文革视为领导人理念的一种展示，赋予了毛泽东对文革

的决定性作用。哈里·哈丁的观点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Harding，1992，p. 20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一书较早地体现对毛泽东的重视，成为费正清的历史主义观点的典型表现。费正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美国与中国》中将毛泽东研究规范化。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概念，凸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不仅成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而且是早期文革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此后的研究出现了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符号化的情形，并使毛主义成为了一种“类意识形态”话语。（Xiao，2003）

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的第四章《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中，将毛泽东自身思想的演变和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和元素进行交叉讨论，从而将文革的过程看作是政治的王朝更迭（接班人问题）和毛思想的展开（毛主义逻辑的铺陈）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套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虽然强调了综合因素对历史嬗变的作用，本质上依然是“英雄史观”和政治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变体。其研究方法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在这一叙事下，文革变成了一场封建式的“宫廷战争”，成了“帝王将相”同场竞技的舞台。（MacFarquhar，1992）

中国明清史专家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尝试综合运用王阳明玄学、公羊学说、黑格尔哲学等一众的中西方哲学思潮来透视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元素。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影响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潮之一，而没有将其视为其中最关键的要素。（Wakeman，2005）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一文，试图将毛主义归纳为辩证法和阶级斗争这两个理念；同时，他肯定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式的道路”的求索，这使得他在评价毛时采取了二分的态度。他依然具有一种历史视角的学术关怀，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寻找文革的资源，他甚至将毛与秦始皇相提并论。（MacFarquhar，1992）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毛的一生，认为毛是一个“粗莽的哲学家”，“推动毛前进的内在力量是对最残忍的家伙们的憎恶，它出自毛个人的反抗意识”。提到文革时，作者同样坚持毛“在解放人民方面是光辉的，但在管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方面则是不成功的”。作者力图向我们呈现的仍然是一个中国旧式君主形象，只不过这个君主刚巧又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哲人而已。毛虽然试图建立平权，带有民主的端倪，但却具有基督教式福音主义的霸权特征。（Wilson，1993，p. 494，p. 499）

上述种种研究还有很多，国内有不少译著出版，但有两点倾向值得注意。第一，有些作品带有比较的、甚至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以妖魔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形象进行污名化处理；第二，有些作品强调中国政治体制的前现代特征，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神圣化。前者丑化了中国历史，后者则简单地将中国现代历史回归到“农耕文明的乡土皇帝”时期。

## （二）精英群体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类研究开始将视野从毛泽东的身上扩展至其与上层精英的关系。英国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着重研究并叙述了中共党史上“十次路线斗争”。在她看来，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及中共党内实际情况的认识有误，在于由此错误认识产生的善良而又根本不着边际的使命感”。(Holinworth, 1995, p. 4) 她开始将文革原因置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去思考，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权力意志，虽然作者仍然强调了毛泽东复杂的人性特质和超绝的政治手腕对于文革发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本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界逐渐摒弃简单的政治话语叙事和个人权力意志说的思维模式。

李泽厚认为，不能简单把文革视作是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是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夺势，“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的情况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两者是混在一起的”（Li, 2003, p. 189）。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史料详实，试图理解毛泽东“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主张，并强调正是这一理想最终形成了毛个人对抗中央集体的态势。而种种问题的衍生，例如武断专横、批反党集团、重用奸佞小人，都是基于这种“孤胆草莽似的悲情英雄”情结。作者观察到了文革发动的原因和其实际后果之间的落差，强调了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支配，淡化了个人对历史的决定性力量。（Wang, 2005）高皋和严家其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是文革研究领域重要的论著，它最后将文革发起的根源导向了中国对于一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缺失上，从而将历史动因的探究对象由个人转向了制度，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跳出单一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桎梏，寻求制度漏洞和缺陷的努力。

### 三

随着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出现了一种以文化和制度为纽带的，强调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分析框架。

#### （一）通过国家力量重构社会的努力

对文革的研究，许多学者对文革当中毛泽东推行的“反官僚制度与反不平等体系”等有广泛的兴趣，因为这些努力意味着通过国家或政党力量来重构社会。

首先，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摈弃了科层制的官僚体制，在运动中，所有级别的国家机构都遭到了清洗，大量的国家干部被迫劳动改造，专业技术人员受到控制；所有规章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忠诚。此时，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参与式民主，大众有权来批评领导，实施了由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众来行使权力的体制革命。这样的一种社会实践，吸引西方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研究围绕着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一个大型的行政机构能否只靠少量的正式规定和专业人员就能有效地发挥功能？第二，有效的科层制与大众民主的实践是怎样的关系？中国的制度变革的实践挑战了现代管理体制中科层制的必要性。（Nee, 1973; Whyte, 1973）

但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变化使对科层制有效的研究和思考具有新的空间，学者们看到“反官僚体制”的努力只是暂时的。在政治上积极和忠诚的同时，官僚机制更加庞大，大众民主成为空洞的形式，专断权力更加集中在各级组织的官僚手中。对这一现实的反思表明，毛泽东创立的替代科层制的大众民主的政治模式，不是什么新的模式，而是一种“家长制”或“新传统主义”。（Walder, 1986）

其次，文革中实施了一系列的平均主义的社会政策和分配模式，这引发了学者们对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学术兴趣，但学者的研究结果却令人吃惊，那就是毛泽东式的发展模式加剧了多种不平等。

从城乡差别看，一方面，是城市内和农村内存在明显的收入平等，但区域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却显著扩大。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从五十年代的大约二比一扩大到三比一，甚至是六比一；这种差距取决于国家对城市住房和食品消费的补贴程度。(Parish, 1981; Whyte, 1986)

从性别差别看，一方面，妇女被动员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妇女就业并未降低两性间的不平等，反而产生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妇女依然要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问题的关键是，不是革命提高了妇女的就业，而是对家庭结构的改造，如以户为单位的居住制度、从夫而居等使男性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强化了传统家庭制度。

从代际流动看，文革期间，学校的学制缩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政策使地位获得机会完全平等，被称为是一种“去分层化”，但这种中止年轻一代地位获得的状况是在关闭学校、冻结工资和停止职位提升的状况下发生的。(Parish, 1984)但也有学者看到，在文革期间，按照政治标准划分“出身”的办法全面影响了不同群体对各种生活机会的分配状况，血统上的政治身份导致了那些父辈是被剥削的阶级、党员等在招生、分配工作和提升上的不同优先权；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等属于中间地位群体；而以前的剥削阶级、国民党分子的后代们则受到歧视。(Kraus, 1981; Whyte, 1975、1985)学生和工人们强烈地意识到这些人为的地位标记，并对友谊以及红卫兵运动中的政治派系形成重要影响。(Chan, 1985; Unger, 1982)

刘小枫认为，“文革的实质是，政治不平等的制度中，各阶层之间或阶层之内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斗争符码的政党国家一体化结构的内在冲突。”(刘小枫, 1998, 第430页)，因此“文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众运动，而是政党运动群众的运动”。(刘小枫, 1998, 第398页)

## (二) 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

有学者注意到文革中精英集团或党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李鸿永指出，文革中精英集团企图动员和操纵群众，但党组织的控制力一旦削弱，社会中所有潜伏的力量和矛盾就会表面化，这使得群体运动依靠自身的力量前进。群众组织把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当成追求小集团利益的工具，合则拥护，不合则抛弃。严重的官僚化使党和群众的关系疏远，并淡化了人们对平等的要求。在组织上，激进的群众组织主要是由无特权的社会集团组成；保守派主要由那些出身优越的成员组成。(Lee, 1978)

White 在分析文革中的暴力问题时，将中国社会的矛盾模式引入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暴力反映了中国社会三种主要的矛盾，在这三种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文革，这些矛盾是：第一，身份的认定，如扣“帽子”(工人、干部、地主、反革命)的做法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的划分赋予了人们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第二，组织内部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这种关系依然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第三，周期性的群众运动，正是这种周期出现的群众运动使得暴力合法化。(White, 1989)

Whyte 的《中国的小群体和政治仪式》一书较早地分析了中国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改造民众的艰难程度。他用“遵从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民众的力量。从服从的类型看，有三

类服从，即基于威逼和强权的强制性服从、基于奖惩的功利性服从、基于信仰的规范性服从。不同的服从类型需要不同的组织形式。毛时代的国家目标是通过广泛的小群体组织制度使国民达到很高程度的规范性服从；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国家不得不对一些重要的组织中的人实施奖罚制度，以增加服从程度；同时，对于奖罚较少的地方，如农村，服从程度则大为降低。对于城市中的工作组织来说，国家只能通过强制的或功能的手段实现民众的遵从。(Whyte, 1974)

有学者认为，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系统绝非浑然一体，相反，它包含了许多不协调、有时甚至矛盾的部分。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的务实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多层面而不单一的儒教传统。有些文化主体被国家全力推广，但其他的则得到农村社区机构，特别是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支持。如在广东农村中，干部和群众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文化重新组合。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文化构件的重新组合的互动，发展出各种影响到干部或普通公民的行动方式。农村干部的行为表明，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亦被国家所改造。国家和社会都不是西方模式的“现代”政治组织或“传统”意义上乡村社区。但两者都极具中国特色，是一种独特的、不断变化的、包含昨日和今日的中国文化的各种成分混合体。(Madsen, 1984)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强调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渗透，传统文化和社会已经以许多方式在中国国家结构中自我再生，尤其表现在国家是部分建立在庇护与受护之间的个人关系之上，而并非是普遍性的行政系统规则。新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任何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都会存在改变原有的某些传统，同时保持某种连续性，这种转型就是一种“新传统”。华尔德提出了“庇护关系”的概念，在中国单位组织的制度文化中，核心特征是一种庇护关系网络的存在，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工厂领导与各级分子之间。这种关系在西方也存在，但相对来说并不普遍，人们往往将其归于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结构，而不是正式结构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单位中，这种庇护关系系统是不能离开正式组织而单独存在的，这种关系受到官方的支持，是其组织角色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关键点在于，个人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和物质利益是联系在一起。华尔德通过对中国单位制的研究提出，单位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庇护者-受庇护者”的庇护关系所形成的基本单元，其中领导处于绝对的权力地位，而职工或是争当积极分子，或是发展与领导的私人关系，以争取由单位配置的有限资源。(Walder, 1996)

#### 四

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帕森斯理论的终结，这意味着社会学者再也不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系，而是将社会看作是各种社会结构形式的混合物——包括家庭、当地社区、利益群体、地位群体等。它们由某种权力结构组合起来，这些权力结构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在对各个历史环境的因应中发展起来。如果没有大体系的瓦解，则“传统”的、前现代社会不会因革命性变革而消失。由这个理论角度出发，中国研究就展示出一幅社会群体的组合图景，一些旧社会的残余仍然存在，并且与现代国家的权力相抵触。(Madsen, 1999)

以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反思文革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文革毕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尽管其是由毛直接发动的，然而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纷纷参与其中，并且直接改变了运动的方式和进程。就文革研究而言，最初受到关注的社会群体仅仅局限在党和国家干部、人民军队、红卫兵以及工人造反派，承认这些群体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政治叙述的意义上成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一些学者反对将这些社会群体作为上层领导人争权夺势的注脚和投射，而是将其看成是重要的社会行动者，由此开辟了文革研究的另一路数。

### （一）大众利益与大众运动的自我逻辑

李鸿永（Hong Yung Lee）1975年就注意到，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运动”中，一些社会集团发现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并激烈地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另一些社会集团则力求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生了激进派与造反派的分化。其基本的区别是：前者认为运动的对象是“走资派”，后者认为运动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的问题突出出来，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对于工人来说，经济因素对其派别的形成起很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地位较低的合同工、临时工、小厂工人等构成了激进派的主力。（Lee，1975）

陈佩华（Anita Chan）提出一种“社会冲突模式”来理解文革。她认为，如果将文革说成是一场以老干部为一方，以毛和四人帮为一方的权力斗争，根本就是抹杀了人民，尤其是抹杀了红卫兵青少年在文革中的作用。她强调，在文革中群体分裂为严重对立的两大阵营，即保守派和造反派，这种对立反映了文革前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矛盾。（Chan，1992）

有学者则认为，在整个文革运动进程中，中国的普通民众所展现出的惊人的政治行动能量使得我们绝对有理由舍弃原本占有主导地位的解釋路径——极权主义模型而转而寻求其他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性力量的新的诠释方法。（Perry Li，1997）这些研究是以红卫兵群体和工人群体的研究为主要内容。

### （二）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

Elizabeth Perry 和李逊合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一书力求人性化地对工人运动进行解读，并寻找一种对工人行动的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方式，那就是要分析工人分化的基础，探讨工人运动与同期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行动间的关系，以及解释中国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变化的潜能。该书通过对上海工人的分析来讨论“大批判”（popular protest）的本质，作者放弃了从宏观的角度整合各种因素的努力，而是遵循就事论事的原则，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解释文革中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暴力冲突。作者认为，即使是在国家的威权之下，大批判的行动也并非是以无定式和无组织的状态进行，而是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更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纽带，呈现出多样性。虽然文革一直被称为“大乱”，但是它同时也孕育了一大批自下而上的组织。毛泽东思想主导下的国家，与其说是压制了群众，不如说是催生了“集体性意见分歧”（collective dissent）的可能性，这种具有集体性的不同意见，在地方领袖的主导下，大众无组织的行动转变为清晰可辨的不同的社会联系，并实现了大众行动的组织化过程。作者强调，文革中所出现的真正了不起的并不是压迫性政治氛围自上而下的渗透，而是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大众的政治反应，以及这些政治反应表达出来的多样性。（Perry，Li，1997，chpt. I）

该书将上海工人分为三种类型：造反派、保守派、经济主义派，并应用不同的解释框架，辨识出三种不同的行动取向。造反派意在挑战党内的某些权威；保守派则极力维护那些权威；而那些经济主义派的组织则渴求社会经济中正义的实现。工人们各有各的目的并且为此而苦心钻营：造反派、保守派、经济主义派分别效忠于不同类型的领袖，他们的行动分别建立在相异的动机之上。这些明显的差异性，正如我们之前所阐述的，只有依循不同的分析传统才能够得到最佳的解释。

作者特别强调在1966年至1967年中国城市中刮起的“经济主义风”，这一风潮在地域上的差异正表达了中国普通民众中社会经济状况断裂之大的现实。民众的分化一部分是被国家政策生产出来或加以恶化的。普通市民明显的区隔表现为：阶级出身的好坏、城乡户口的差异、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差别、国有制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相对的分化，这些分化明显是社会

主义者倡导的产物。不管怎样，即使这些对立项都是国家强制的结果，但上述类别的划分确实生产出了互相对抗的利益诉求，而这些诉求便构成了一种群体政治格局的基础。在文革期间，受惠于国家的分化策略的群体渐渐趋向于形成保守的组织。

对此他们使用 Walder 所强调的庇护与忠诚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关系，强调保守派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文革之前与党内的庇护主义的非正式网络有着紧密的联结。他们是典型的激进主义分子，团体中领导人和副手、普通党员、劳动模范、共青团员和其他一些公认的积极分子。”（Walder, 1987, p. 82）这一群体尽管明显地被国家规则所形塑，但利益群体这样的“委托-代理”的网络结构在其他的政治体系中也可以找到。造反派是文革中最复杂且事后证明最有影响力的工人行动派的一支，作者使用了与传统分析相去甚远的分析框架，强调了中国政治格局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对抗的亚文化，一些胆大的个人会跃起挑战权威人物，反映了政治大环境中的个人雄心和智谋的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些并不是“心理依赖”的人格特质——渴望臣服于上级领导所能够解释的。那些奋起挑战权威、批评党委和工作队的工人是一群不同寻常的、无畏大胆而且雄心勃勃的工人，他们精力充沛同时又暴躁易怒的人格特征往往脱胎于他们艰苦的家庭状况，滋养于经营在正统的党组织生活边缘的暴徒无赖的亚文化。北方籍贯人士、贫民区的童年生活以及青年时代的帮派经历都为造反派领袖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Perry 延续了她的地缘政治的理论，强调地缘性的身份认同在造反派的派系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作者关注社会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图景：一些工人深陷党内庇护网络中，他们倾向于采取服从的策略，成为保守派；一些工人从那些与正统的政治网络不相适宜的亚文化中获取了力量，挑战党内权威的霸权，成为造反派；还有一些工人表现出对于物质补偿的极大的关注，要求获得收入补偿、改善工作环境等等，他们对捍卫或是打倒党内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游戏并不感冒。也就是说，单位制所诱导的绝对不止是顺从和依附，还有挑战和抗衡，两种态度都指向了个体的工作场所中的权威人物和体系自身的结构性特征。（Perry, Li, 1997, chpt. VII）。

在注重群众运动的能动性的方法论基础上，Perry 进一步引入了一种“情感模式”。Perry 认为，在文革中，原本存在的劳动人民与地主、资本家之间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冲突已然不存在了，所以不得不生产出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以此催化情感革命，在群众运动中，“文革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的”。情感工作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新活力，只是到了文革的批斗大会的形式，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情感模式”的讨论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强调：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却具有独一无二的改变言说者的能力。（Perry, 2001）

## 五

今天研究文革，应当更重视其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意义，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国现代历史，虽然有许多的反思性文章看到了文革带给中国的“灾难”，但是也应当通过研究文革了解中国社会，以防止更多的社会危机。文革应该成为研究的模本，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中介，这是我们在从事文革研究时应该致力的一种观念。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强调要重新恢复对文革的研究时指出：

正因为出现这种历史被抹杀的情况，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文革的历史事件地位，这不但是为了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正视它，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我们的批判自觉，好让我们亦能以批判的态度正视那些因为抹掉革命历史而被束之高阁的现代问题。（Dirlik, 1996）



这需从几个方面对历史的反思。

第一，需要多元的理解分析框架。在这一点，Perry 强调的不同的群体应当应用于不同理论来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社会下的个体绝不可能是些“原子化”的个人，中国社会在表面的同一性之下隐藏着各种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这将成为中国社会向一个现代性国家发展的原动力。这种情形在各种政治事件中都会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现。

第二，要看到文革的破坏力，也应看到文革在大破坏的同时产生的正面影响，即不仅看到文革的失败与弊端，也看到文革前的弊病；看到文革带给中国人对暴力和“动乱”的拒绝姿态。文革促成了中国人反思中国政治制度，并改革中国制度的愿望。正是经过文革，人们政治觉悟和以前大不一样。人民在文革中享受过空前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组织，利用大字报等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希望。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经历，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Meisner, 1986) 文革虽遭否定，但却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持久的东西，反官僚、反权威的精神是人们的宝贵经验，青年一代学会了独立思考。

第三，需要去魅化地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追溯文革研究的变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西方在文革研究中都遇到了自己的困境：中国不断压抑，而西方不断窥视。文革对中国是个禁区，于西方则是个黑洞。我们的确无法将历史和政治截然分开，历史叙事的权力一直都是政治威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是，认识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真正认清我们自身，以明确我们的历史境遇和责任担当。

从全球看，对文革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承认中国的文革已超出中国国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并特别深入地影响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法国的林荫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文革不仅在理念上提供了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同时也在实践上也提供了激进变迁的经验。我们只有把文革理念和实践看作是二十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中政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才能更好地判断其理念、价值和实践意义。

#### 参考文献

Arif Dirlik,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 Marxism*. In Arif Dir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7.

Chan, Anita 1985. *Children of Mao*.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VII.

Chan, Anit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 No.1.

Kraus, R. C. 1981.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e, Hong Yung 1975.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64 December pp.645-83.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dsen, Richard 1984.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isner, Maurice 1986.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Nee, Victor 1973. Revolution and Bureaucracy: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ee, V. and Peck, J. (eds.) *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New York, NY: Pantheon, pp. 223-414.

Parish, William L. 1981. 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 *Problems of Communism* 29: 37-53.

Par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Watson (ed.) *H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4-120.

Perry, Elizabeth J.,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Perry, Elizabeth 2001, “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第4期。

Schurmann, Franz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nger, Jonathan 1982.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nflicition Canton Schools, 1949-1980*.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der, Andrew 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华尔德：1996，《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Walder, Andrew G. 1987. *Communist Social Structure and Workers' Politician China*. In Victor C. Falkenheim, ed.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White, Lynn T. 1989.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hyte, Martin King 1973.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49-63.

Whyte, Martin King 1974.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hyte, Martin. King 1975.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64: 685-711.

Whyte, Martin King 1985. The Politics of Life Chan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Y. M. Shaw (eds.)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RC*. Boulder, CO: Westview, pp. 244-65.

Whyte, Martin King 1986. Social Trends in China: The Triumph of Inequality? In A. D. Barnett and R. Clough (eds.) *Modernizing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p. 103-23.

德利克：1996，“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37期。

高皋、严家其：198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人民出版社。

哈里·哈丁：1992，“危机时期的中国”，载麦克法考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霍克海默：1997年，《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

霍林沃思、克莱尔：1995，高湘、尹赵、刘辰诞译，《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泽厚：2003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刘青峰（编）：1990年，《历史的反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刘青峰（编）：1994年，《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刘青峰（编）：1996，《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刘小枫：1998年，《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迈斯纳：张宁、陈铭康等译，2005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迈斯纳：张瑛等译，1992年，《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麦克法考尔、费正清：1992，《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曼海姆：黎鸣、李书崇译，2000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

萨义德、爱德华 W：王宇根译，1999年，《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

史华慈、本杰明：陈玮译，2006年，《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晖、陈燕谷（主编）：1998年，《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

王逢振（主编）：2000年，《六十年代》，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年一：2005年，《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绍光：1993，《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王正毅：2000年，《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威尔逊、迪克：19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历史巨人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魏斐德：李君如等译，2005年，《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吴乐道：《文革与中共对反制度化组织型模之寻求：历史与比较的分析》（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81年。

萧延中：2003，“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类型、概念与意义——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而作”，《教学与研究》第12期。

萧延中：2005，《巨人的诞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徐友渔：1999，《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张化、苏采青（主编）：2000年，《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赵文词(Richard Madsen)，1999，“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载涂肇庆、林益民（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Oxford University.

佟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100871

沈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00871

□ 原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

【文献资料】

上中共中央、毛泽东书

• 姜明亮 •

〔编者按：姜明亮（1942年2月～）男，安徽人，1964年8月入西北工业大学水中兵器系，攻读水声专业。文革开始后，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与他的三位同

窗好友闻福众、吴小林、胡清亮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系统的批判。他写了长达万言的材料，上书中央。并于1968年4月写成长达35页的批判林彪、江青的大字报贴到校园。当天，姜明亮即被打成“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惨遭毒打，倍受折磨，关进牛棚，强迫劳动。）

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

随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断深入，许多问题使我们越来越想不通，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林彪的许多错误思想和理论越来越发展，许多荒唐的错误行动蔓延全国，令人痛心疾首，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我们忧心如焚，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我们不得不直言：

一、林彪关于“老三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灵魂，核心的核心”。这一论断是荒谬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为马列主义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林彪这样提并在实践中把它推向极端，恰恰是扼杀了马列主义的核心和灵魂，把全国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引向歧途。老三篇所列举的事例，是历代统治阶级都可以接受的，过分的宣传会导致奴隶主义。林彪的做法和孔孟之道如出一辙，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上林彪是在搞“愚民哲学”。因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这和敬爱的周总理大力倡导的“两论起家”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

以下将要列举的林彪一系列形而上学，大搞愚忠的作法和说法，都散发着“愚民哲学”的味道，哪有丝毫共产党人的气味。

二、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但在实践中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绝对化、神化了。难道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几十年来说的都是真理？为什么毛主席只主张出选集而不主张出全集呢？既然句句是真理为什么不可以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随着时间、历史、社会环境的变迁或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真理大致上会出现二种变化：一是在新的条件下将被新的真理取代或包含，从而向前发展了。二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但这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在现时都有铁的事实证明林彪说错了。在“十六条”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强调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人民都认为是真理，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全国数亿人，人人学习，最近红旗杂志连发了三期社论，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成千上万只喇叭何止广播了几亿句，为什么在对当权派的武斗愈演愈烈之后，现在又发生了各派组织之间大搞武斗，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西安都动了坦克，也是愈演愈烈，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严重损失，为什么毛主席的话在此就不顶用了呢？数亿句也不顶用了呢？屁用不顶，现在是各取所需！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陈伯达走一路，一路发生武斗，这在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操纵下的文革能出现如此怪事，究竟是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三、林彪提出“政治可以冲击其它”岂止是可以冲击其它呢？实际上是冲击一切，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突出政治走向了极端，真理和谬误往往只差一步之遥，真理被推向极端就适得其反，走向反面。现在全国工人不做工，干部不工作，学生不学习（至少在西安是如此），幸亏农民不拿工资，否则，全国人民将喝西北风。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现实吗？真可谓国将不国，民将不民，长此下去，国家前途堪忧。

四、林彪说“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试问，不理解的怎么去

执行？不理解的在实际中如何能执行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事都要向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有道理。可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盲从，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盲目的表面上的毫无疑义的去执行上级的指示，实际上是消极怠工最好的办法；可见林彪是公然提倡盲从，走向极端就是大搞奴隶主义，难道这不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吗？可以想象得到，到一定的时候，有人会利用人们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利用人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假借最高指示而以售其奸。杨成武事件的出现，难道不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吗？

五、林彪关于“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高得多，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论断是错误的，不但在理论上不通，在对外宣传上更是不利。我们认为：马恩列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分别建立了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后人成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的，没有马恩列斯，也不会有毛泽东，他们同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能说谁比谁高得多。

“顶峰”论更是理论上的错误，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真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更是不断发展的，是不可穷尽的，绝对化就否定了真理，也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本身。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做法，在国际上效果很差，对我们不利。因为在当代国际共运中，马克思和列宁的威望仍然是最高的，林彪这样说，这样做，明是抬高别人，实质是抬高自己。

六、现在，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已被引向歧途，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已经被庸俗化了。“天天读雷打不动”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早请示晚汇报”实际上是逼着人们说假话，甚至解放军站岗都只拿“红宝书”而不拿枪了，如果真的遇到了阶级敌人破坏，用什么去抵抗，不用说当“原子弹”用了，连当切菜刀用都不行，何以对付敌人，多么可笑，多么愚蠢的事啊（至少在西安是如此）。

七、提倡愚忠，大搞封建迷信，现在到处出现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忠字舞，大像章，都是从部队开始，传遍全国。连封建王朝也不曾有过的事竟然发生了，特别是不论干什么都要三呼万岁，再三呼万寿无疆，这在封建王朝只有大臣上朝拜见皇帝才有的最高仪式，而现在在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则人人皆搞，事事皆搞。远远超过了封建社会，令人震惊，我们在大街上经常看到解放军战士胸前挂个或缝上个“忠”字，只差背后有个“勇”字了，否则，和清朝的小卒有何本质上的不同。更有甚者，毛主席的书叫宝书，像叫宝像，明明是“买”，却偏偏说“请”，联系到封建社会人们去庙上请愿的事，真叫人啼笑皆非，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散发着封建迷信的味儿，这难道都是共产党人所能提倡的吗？还有，现在风行全国的在12月26日吃寿桃，搞祝寿，不是公然违背了延安整风的决议吗？

八、现在到处都在搞万岁宫，大塑像。大像章，用掉了多少亿的财富和原料，难怪群众中流传着还我飞机，还我工厂的呼声，这从根本上是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主张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宗旨的，拿这些财富多建设一些工厂、学校，那该有多好啊！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本意。更有甚者，在广大农村，农民每天劳动所得可怜只有几角钱，却村村有宝堂，家家有宝书台，人人有宝书，而不问是否有文化，使农民每天一角钱的油盐酱醋都成了问题，这样做的效果实在堪虑！综上所述，纵观中国历史，风侈、政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有虚无实，内部纷争蜂起，难道不是国家将要衰亡的象征吗？

九、林彪最近提出了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三条标准为“高举不高举，干劲大不大，看大节，偷鸡摸狗是小节”。直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五条”唱反调，实际上是强调对他林彪紧跟不紧跟，所谓大节论，实在是为了结党营私的需要，看看邱会作的例子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十、贺龙同志在创建红色根据地时就对党忠心耿耿，在艰难困苦中，蒋介石出高位，重金而不被收买，何等高尚的革命气节，可贺龙元帅从延安起就转向搞体育，建国后不抓军权了。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是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推荐了徐寅生的讲话，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推广了唯物辩证法，何以忽然成为“不看书、不读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军阀、大党阀、大野心家”了呢？不主持军委工作，仅靠少数体育运动员何以搞“兵变”，联系到最近西安钟楼的“反革命事件”，竟把全国人民人人皆知的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也说成是大军阀，大野心家，那么多元老、元帅忽然都成了大军阀、大野心家，此理不通！林彪等人究竟在干什么？！相反邱会作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难道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还有，我们在对领导人的评价上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还不如联共（布）党史，（如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比如对刘少奇的评价，似乎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是封建脑瓜，自参加革命以来没做一件好事，光干出卖的事，投降的事和坏事，却为什么能当上国家主席？能说得通吗？那么多的叛徒出现，岂不是否定了延安整风吗？

十一、现在到处都在喊“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本质上有什么两样，用封建的正统观点来看，可以说是欺君罔上，这意味着什么？

十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杨成武事件中指出了“大树特树”的实质是“名曰树别人；实则树自己”，真是一语切中要害，但是叶群在军委一次讲话中却一口气讲了林副统帅一贯注意四个大树特树，道破了天机！叶群是林彪夫人，又是林办主任，讲的肯定是真话，叶群总不致于去陷害林彪吧，那么林彪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十三、林彪在5.18讲话中一口气讲了古今中外的几十个政变经，我们怀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十四、我们认为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他们正式勾结、相互利用的开始。这次会使江青走上了政治舞台，而林彪则利用江青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夫人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十五、江青、张春桥等在上海大搞群众专政，并发表群众专政好的社论，进而砸烂公检法，对全国影响很大，我们认为这是在搞无政府主义，在群众专政口号下，可以随心所欲整人，无法无天。

十六、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肯定和提倡“文攻武卫”，一时间全国的武斗风盛行，且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去打入，在全国，动用枪炮子弹的残酷武斗，无形中被合法化了，难道这一切江青不知道？作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全国耳目众多，肯定知道（参见江青接见新华社代表时的讲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统一论者。她的话使武斗合法化，造成了全国性的大武斗，大破坏，又不及时制止，任其发展，不是挑动武斗的祸首又是什么？

现在林彪和江青打得火热，在传达杨成武事件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林彪对江青的“作用”大加无原则，无内容的吹捧，大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甚至连敬爱的周总理都要喊（周总理根本不需要向江青学习），这肯定是违心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只能说明他们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这一切不能不令我们怀疑，林彪才是党内的“定时炸弹”，且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有野心。而林彪所要搞的只能是封建王朝。毛主席啊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允许我们当面陈诉，即使我们错了，死而无怨！

西北工业大学 姜明亮等
一九六八年四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